

中国近代化 与洋务运动

ZHONGGUOJINDAIHUAYU
YANGWUYUN

DONG

孔 令 仁

山东大学出版社

92
K256.107
1

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

主 编：孔令仁 李德征

副主编：李 岫 李平生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济南

B 862661

鲁新登字09号

BAS/26

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

孔令仁 李德征 主编

·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寿光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 21.75印张 566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5607-0606-1/K·56

定价：10.50元



目 录

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孔令仁 (1)
对讨论洋务运动的一点意见·····	丁名楠 (4)
世潮·传统·近代化·····	吴承明 (7)
清末社会环境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丁日初 (11)
努力开拓洋务运动研究的新领域·····	牟安世 (16)
“洋务”研究随想记·····	宓汝成 (18)
从洋务运动看中国近代化早期的特点·····	胡 滨 (24)
洋务派关于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的决策·····	赵德馨 (35)
再论洋务运动必须正名·····	董蔡时 卢伯炜 (48)
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	
——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	王守中 (64)
中外学者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几点看法	
·····	李德征 (77)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文化·····	郭墨兰 (94)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早期的城市化·····	潘君祥 (111)
金陵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乐秀祺 (124)
论洋务派的外交思想·····	刘天路 (132)
洋务论者的“求强”“求富”观	
——兼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孙占元 (144)
论洋务派的人才观·····	商鸣臣 (153)
洋务派的民生观及其实践·····	李 坤 (163)
官督商办与中国资本主义·····	黄逸平 (175)

洋务运动中的山东采矿业·····	朱以青 (192)
一个近代化尝试的失败	
——贵州青溪铁厂的历史·····	徐宏慧 (200)
洋务派筹办新式海军二题刍议·····	吴士英 (210)
评“李泰国事件”	
——中国近代第一次购买军舰的尝试·····	徐 彻 (219)
论“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事件·····	戚其章 (230)
洋务企业文化初探·····	饶秋根 (246)
洋务运动时期我国科技队伍的规模·····	林庆元 (254)
洋务运动与传统农业	
——试论传统农业对洋务运动的	
影响和制约·····	丁长清 (266)
洋务派的自强观与社会环境·····	杜耀云 (279)
社会环境与上海的洋务企业·····	沈祖炜 (288)
论19世纪80年代洋务企业资金来源的变化·····	竺菊英 (300)
洋务企业与清朝财政·····	周育民 (308)
洋务运动与晚清财政·····	梁义群 (317)
外国技术人员与洋务军事工业·····	张业赏 (337)
西学输入与中体西用·····	陈月清 (345)
洋务运动与传统文化·····	丁贤俊 (357)
19世纪60年代前后西学在中日传播的比较·····	王少普 (373)
洋务、维新与新文化运动	
——试析五四时期先进思想家的	
近代化观·····	吴乃华 (388)
论洋务时期的文化变迁·····	黄清根 (398)
略论李鸿章·····	姜 铎 (410)
论李鸿章的变法思想·····	章鸣九 (425)
李鸿章洋务企业管理思想浅论·····	刘灿河 (447)

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化矿业·····	余明侠 (456)
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	陈尚胜 (476)
略论李鸿章的对日观·····	刘学照 (487)
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评议·····	代 鲁 (503)
试评张之洞的近代化纲领·····	马 帆 (526)
试论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安静波 (536)
论张之洞所办企业中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关 系·····	周 军 (548)
论郑观应的军事思想·····	夏东元 (558)
丁日昌与江南制造总局·····	赵春晨 (577)
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	夏良才 (588)
奕谟与洋务·····	杨益茂 (608)
日意格与中国近代化·····	董方奎 (622)
王家璧散论·····	贾熟村 (634)
西太后与洋务运动·····	任恒俊 (645)
倭仁与曾国藩·····	宫 明 (660)
海关总税务司与洋务·····	陈诗启 (673)
台港学者洋务运动研究概述·····	陆 炎 (678)
后记·····	(687)

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

开 幕 词

孔 令 仁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期待已久的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现在正式开幕了。从全国各地来这里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 120 人。在这些代表中，既有久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又有在教学和科研上起骨干作用的中年专家，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代表们将在这里欢聚一堂，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繁荣祖国的史学事业作贡献。毫无疑问，这次会议将是我国学术界的一次盛会。在这里，我代表本届会议的主办单位，向远道而来参加会议的学术界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预祝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众所周知，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关系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到旧的阶级分化和新的阶级出现，关系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而且也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建国以后，在60年代初期，学术界曾对洋务运动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但后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进行，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就冷落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极“左”路线被排除，洋务运动的研究也热闹起来，取得了可喜

的进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已经举行过四次全国规模的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每次会议上大家都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激烈交锋，确实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8年这10年中，共发表洋务运动论文1千篇，平均每年在百篇以上；共出版各类有关的专著、资料等约有三四十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10年来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无论是从广度和深度来说，从新出的成果来说，都远远超过以往几十年所取得的成绩。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主题，经过多方面的磋商，确定为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在筹备的过程中，北京、天津、上海、济南的学者和专家为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已举行过一次到两次地区性的预备讨论会。我们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在这些地区性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根据各地的讨论情况和收到的论文，经过研究和分析，我们又决定在这个主题下大致分为四个重点问题分组进行讨论，这就是：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洋务运动与洋务人物；洋务运动与近代经济；洋务运动与近代政治、军事、外交、文化。

我们希望大家能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我们提出的重点问题以及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我们希望，代表们能发扬我们过去几次会议的优良作风，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敢于有所建树。我们热切地希望，通过这次讨论会，能把我国研究洋务运动的水平推向更高的层次，推向更新的领域。

这次会议是由《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东营市、胜利油田、石油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联、山东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这次会议得到了山

东省委、省府、省政协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筹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东营市委、市府、市人大、市政协、胜利油田、石油大学等单位对这次讨论会的召开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赞助。如果不是他们伸出热情的手，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如此优越的开会条件。现在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支持与赞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敬祝大家健康愉快、幸福如意。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对讨论洋务运动的一点意见

丁 名 楠

关于洋务运动性质、作用问题的讨论，从60年代初起一直相当活跃。通过多次举行的专题讨论会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对进一步明确洋务派主办的军事工业，特别民用企事业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对早期无产阶级的产生等关系是有益的。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对于了解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开拓视野、深化认识都很有好处。我对于洋务运动没有研究，兹将几点很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向与会同志求教。

第一，洋务运动的讨论范围应扩大

洋务运动牵涉的方面很广泛，目前讨论主要限于经济方面，少谈甚或避而不谈政治方面的问题，看来不利于将讨论引向深广的方面发展，难以对洋务运动得出较为全面的认识。洋务运动的政治方面主要是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对清政府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要采取和平侵略的手段，积极改造中国的地主阶级政权，开导清政府中的当权派，力图使中国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成为它们的附庸。清朝中央以恭亲王奕诉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要督抚为代表，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迎合西方资本主义，竭力主张同它们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和支持下，主持和主办了一系列的所谓“求强”、“求富”的活动。经过大约30多年，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终于形成。这个局面的出现，是中外双方合作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是主要的，但中国方面作为内应，其作用也绝不能低估和忽视。基于以上的情况，讨论洋务运动时似乎不应偏重或仅仅限于经济方面，而应该把政治方面放到重要的乃至突出的地位。

第二、洋务运动的起迄时间

洋务运动什么时候开始，何时结束，较多的认识是从1864年到1894年。我认为似应把开始的时间提前到1861年。奕訢与英法侵略者订立《北京条约》的过程中，根据亲身经历，得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大发现。他认为此次外国侵略者占领北京与过去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以往军事上的胜利者占领首都以后，接着就是改朝换代，标志旧政权的颠覆和新王朝的建立，而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后，并没有企图推翻清政府，于订立条约取得一些特权后，侵略军就从北京撤走。奕訢认为只要按照条约的规定行事，满足他们一定的要求，清政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好相处是完全可能的。他向逃往热河的咸丰帝建议，成立一个专办外交的机构。1861年这个体制较高、权力极大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在北京正式设立。这个洋务“总汇”除办理外交以外还经管通商、海关、开办同文馆等事，以后修路、开矿、制造枪炮、购置船舰等它也过问。成立总理衙门是清政府的一件大事，也是一桩新鲜事，把1861年它成立的一年作为洋务运动的开端是恰当的。至于洋务运动结束的时间是1894年还是1895年，这一点并不重要。经过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标榜的“求强”、“求富”事实证明完全是空谈，它早一年或迟一年乃至迟几年结束都没有多大意义。

最后附带讲一点。洋务原称夷务，总理衙门编纂过道光、咸丰、同治等三朝外交史料，都称之为筹办夷务始末。由于外国侵略者认为“夷”字带有侮辱的意味，提出抗议，不能用

“夷”称呼他们。清政府接受他们的要求，以前用“夷”字的地方以后一律改称“洋”字，“夷务”因此改为洋务。把洋务和运动连在一起使用，是1938年何干之出版的书上首次见到的。但洋务运动的内涵是什么，一直很不明确，极容易引起误会。如果洋务运动的内容仅仅指经济方面的活动，那末有人提出洋务运动应该正名，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世潮·传统·近代化

吴承明

洋务运动史的全国性讨论会已历四届，每届都深入一步，有新的发展。本届的讨论，已越出洋务运动本身，提出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主题，探讨洋务运动与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外交的关系，探讨洋务运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跃进。

我们研究历史，总是从具体事物和专题入手，专题研究得深了、多了，再进到宏观考察。由小而精到大而博，我以为是研究历史的好方法，比那种先设定一个宏观模式，再按照模式诸因素的关系探讨发展过程的方法，似乎要好。例如国外有些人研究中国近代史常用的“冲击——反应”模式，把中国近代史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归之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完全忽视中国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又如“传统——现代”模式，以及经济上的刘易斯模式，把传统的东西视为完全消极的，而且是与现代化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这些理论，我未敢苟同。再如我们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是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一个概括，但也常被用作一种研究的方法或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物都会推导出买办性，而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变成封建的。当然，我这里是说研究历史，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模式的方法或系统论的方法。在我们考察当代社会，尤其在回归检验和经济预测中，这种方法是极为有效的。历史不能预

测，也很难摹拟当时环境，因而，先弄清事实，从因素入手，似乎更好些。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什么是近代化，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我想，从广泛的意义说，近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一个较大的国家或民族，随着时间的演进，它总是要向近代过渡的，只是迟早、道路不同而已。这就是马克思的发展历史观。西方史学家盛赞希腊罗马，而曾把封建的欧洲叫做“黑暗的中世纪”，象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大沉沦。马克思不这样看，他认为，封建社会比过去的奴隶制进步得多，而它还要发展为更进步的社会，也就是近代化。列宁说，马克思是最彻底的发展论者。

西欧的近代化，一般认为肇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巨人也应时而出。当时是些什么巨人呢？从但丁到莎士比亚，大部分是文学家、诗人。当然也有哥白尼、伽里略等科学家，但还不是实证科学家，他们的功绩在于反神学。文艺复兴的巨人都是人本主义，反神学、反封建，因而导致宗教改革，发生了荷兰、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才是产业革命或工业化。

中国有没有这种新思潮呢？我看有的，不过晚了，即始于16世纪的启蒙思想。我们叫它启蒙，不叫文艺复兴，也许因为这些人主要是泰州学派、东林学派，不是诗人。其实，这时期出现的《西游记》、《金瓶梅》以及“三言”、“二拍”等，都是离经叛道之作，至今读之，仍能发聋振聩，令人耳目一新。到17世纪，也出现了几位我看可称为巨人的，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诸公，直到被梁启超称为“思想之解放”的龚自珍。而他

们又多半是余事作诗人。当然，它始终没有形成象西方文艺复兴那样巨大的声势。

另一方面，经济毕竟是基础。13~14世纪，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到16世纪，西欧已经在经济上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即工场手工业时代。在西方的近代化过程中，诸如经济力量的增长，海外殖民地的扩张，荷、英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以及资本价值观念的确立，都是在这个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完成的。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时，蒸汽机尚未在实用上推广。我国在15~16世纪，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有了发展，出现晋陕徽海等大的商人资本。农业方面，诸如地权的公消私长，赋役的由丁入地，地租的定额化和永佃制，雇工人身的逐渐自由，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但由于种种历史条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始终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时代，外国资本主义已经入侵了。

上面所谈，都是洋务运动史前史，未免离题太远。我的意思只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都离不开传统，离不开它原有的经济基础，不能平空架屋。也正如此，每个国家的近代化，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模式，而不能照搬西方。在我国近代史中，有洋务运动这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促进了、还是推迟了、还是扭曲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不过在研究中，不仅要看到外来的因素，还要探讨内部的因素。我们说探讨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中国的实际，百年前以至300年前的实际。这个实际中，有它落后的、消极的东西，但也有它能动的、发展的因素。如果把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初始步骤看，那么，300年前的启蒙思潮，就是洋务思想的前驱，而那种带有微弱资本主义萌芽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与商业，就是洋务运动产生的主

础。洋务运动，也许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被动地出现的事情，但它决不是单纯的“冲击——反应”，也不能完全用“传统——现代”的“翘翘板”理论来论证。

清末社会环境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丁 日 初

在中国近代史这一领域，洋务运动的研究和讨论10年来取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许多近代史研究者都肯定洋务运动时期兴办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资本主义企业，翻译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造就了一批科学技术人员与产业工人，派遣了一批出国留学人员，在外交机构和外交活动方面作了初步革新，在军队的组织与装备的现代化方面也作了努力。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它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同日本明治维新比较起来，30多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中国败于甲午中日战争，再一次割地、赔款、丧权，更深地陷入屈辱的困境。就这一方面来说，否定洋务运动的论者的某些意见是值得考虑的。但是，不能因为洋务运动收效不大，就连洋务运动本身也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且，对洋务运动收效不大的原因，还需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以及洋务派本身的素质等条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论断。

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以“社会环境与洋务运动”作为主题之一，必将推动洋务运动史研究深入发展。我愿意就这一问题讲一点初步考虑到的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批初具世界知识的清廷重臣和地方